

共产国际的国际传播理念与实践

程曼丽^{1,2}, 赵晓航³

(1.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 北京 100871;

3.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共产国际的传播理念和实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以及第一国际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深受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共产国际的国际传播具体体现了以明确的思想引领传播、以规章制度指导传播、以人为媒嵌入式传播、以出版物为依托广泛传播以及针对不同议题进行精准传播的特点。在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特别是其高度集中的组织管理形式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影响了与各党的平等关系。

关键词: 共产国际; 国际传播; 列宁新闻思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 G21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2-0094-07

历史上,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有第一国际(又称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第二国际(又称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889—1914)和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1919—1943)。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1],第二国际“为这个运动在更多国家的广泛开展准备基础条件”^[1](291)],那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则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二国际因“被机会主义征服”(列宁语)而名存实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亚洲等地区相继兴起工人运动,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19年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亦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21个国家、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由列宁(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领导创建,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加入其中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在共产国际存续的24年间,共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帮助欧洲、美洲、亚洲各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培养骨干,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

共产国际的传播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以下将从几个方面讨论共产国际国际传播的特点。

一、以明确的思想引领传播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对指导各

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联合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自筹建之日起,在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理念、第一国际历史传统以及列宁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就积极践行着国际主义原则。

共产国际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第二国际时期松散的组织重新整合起来,彻底改变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筹备成立共产国际期间,俄共(布)中央外国人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小组成员主要是在俄国的外国劳动者和滞留战俘,他们的任务之一是联合国外所有的共产党人进行反对妥协派的斗争,把外国共产党团结到共产国际之中。列宁十分关心该小组的活动,将其视为共产国际的重要基础之一。^[2]

列宁在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致词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紧进行……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3]

此后,列宁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明确共产国际开展联合抗争的必要性。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4]

根据列宁提出的战略主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在共产国际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5]列宁高度肯定和赞扬这一口号,认为它正确概括了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

基于列宁的主张,共产国际(列宁本人)就一系列重要议题进行引导:

一是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尽管种族问题在美国由来已久,但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初(1919年),并未将工人运动同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领袖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提到:“共产党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最初来自莫斯科的推动,而这一政策的所有进一步阐述都来自莫斯科。”^[6]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议征求各国党代表的意见,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左翼新闻记者、诗人、政论家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发言中提到了美国的种族问题,认为美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把黑人视为劳工,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置身于黑人运动之外”。这也是美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国内种族问题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联。此后,美国的种族问题被纳入共产国际的议程中,在1921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专门成立了黑人委员会。

二是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问题。1921年5月,法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马赛举行,会上通过了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决议。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列宁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在《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7]一文中,列宁基本上赞成法国共产党的决议,同时指出了提纲对帝国主义时代农民的分化问题以及对剥削农民的各种形式的区别谈得不够。

三是欧洲各国的选举问题。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曾就是否参与议会选举问题致信共产国际,征询意见。列宁就此给予直接的回复与指导,认可“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和参加议会活动”的提议。这些信件被刊登在《共产国际》等报纸杂志上,这不仅对于致信共产国际的国家,还对于许多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同样具有宣传和指导作用。例如,1920年8月31日,在维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396号上刊登了列宁《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信中认可“共产党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4](797)}。1920年10月,列宁会见英国共产党员威廉·波尔(William Ball)时建议“英国共产党人应该讨论即将举行的普选的态度问题”^{[4](806)},这一谈话记录刊登在1920年12月2日的《共产国际》上。

二、通过建立规章制度指导传播

作为共产国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党，联共（布）以自己的章程和决议为蓝本，制定了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必须依照执行的规章。

1920年列宁在拟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强调党报必须由党直接掌管，要求党报工作者应具有严格的党性，遵守党纪。《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明确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以及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不论当时整个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执行不完全是党的方针的政策。”^{[4](646)}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组织在办报内容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以及被认为同情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和组织，其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决议。”^{[4](68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分两章对宣传工作和党的报刊任务进行了说明。一是关于宣传工作的总体原则，“提纲”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扎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必须来自工人的具体生活，来自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愿望，特别是来自他们的共同斗争。”^[8]二是关于宣传工作的策略方法，“提纲”指出共产党宣传鼓动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包括对个人的口头说服、参加工人的职业运动或政治运动，以及通过党的报刊和书籍扩大影响。三是关于党报纪律，“提纲”建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应创办中央机关报，并且明确规定：“任何一种报纸如果不服从党的指示，就不能被承认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四是关于党报的运营，“提纲”作出专门要求，指出为了保持党报的独立性，应妥善组织报纸的广告业务，避免报纸的运营受制于“大广告订户”。

此外，共产国际的文件还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妇女、青年群体等的宣传鼓动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中，明确提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设国际妇女秘书处，其任务之一是“搜集各国女性共产党员的报刊文章，例如杂志、‘妇女版’、传单等，并帮助各国之间相互交流”^{[4](87)}，通过编写和散发传单、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影响那些“对党尚有戒心的妇女”^{[4](84)}。对于青年群体的宣传，共产国际则明确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宣传共产主义与青年运动的思想”^{[4](90)}。

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管理机制受到共产国际的深远影响。在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以《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文件为蓝本，规定了“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总之，加入共产国际后，中国共产党在党报管理方面严格恪守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早期党报都是由党的骨干分子创办或领导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又全面学习苏联，建立起以中央机关报为核心的党报体制。^[9]

三、以人为媒进行嵌入式传播

相对于苏俄同欧洲各国在地缘和文化上的接近性以及传播可以无障碍进行的特点，共产国际对于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远东各国的传播，更多采取以人为媒的“嵌入式”传播方式。

1919年8月，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这一建议得到俄共（布）的批准。同年，维经斯基作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来到伊尔库兹克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工作，他在远东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支持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加强宣传鼓动工作, 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2](38)}。此后, 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建议, 由一个“直属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的中心机构来协调”远东各机关的工作。

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荷兰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执委马林(Maring, 马林系其笔名, 原名为 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也提出建议:“这里通过的提纲^①, 由第三国际以几种东方语言来发表, 并专门散发给中国和印度革命者。”他提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 因为现在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必须把那里已经开展的工作统一到一个局内, 集中进行宣传, 而在莫斯科是不能圆满地进行这个工作的。”^{[4](241)}列宁赞同马林的建议, 并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 到中国协助建立共产党。^[10]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国的实际指导, 共产国际逐步建立起从事东方工作的组织网络, 并实际参与到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1920年5月, 专门负责协调远东事务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亚书记处成立。^②东亚书记处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所进行的宣传组织工作。早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中国代表刘绍周就介绍了1918年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局势, 指出“学生认识到孤军作战一事无成, 开始着手争取工人阶级”, 而欧洲的工业危机波及中国, 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也令人绝望, “贫农会自愿追随城市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 因而中国拥有“从事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 建议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4](225-226)}。1920年4月,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 在北京见到李大钊, 并在北大图书馆一同讨论中国建党问题; 之后维经斯基转道上海见到陈独秀, 并向陈独秀提出关于建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陈独秀的认同。1920年8月,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并担任书记。在上海, 维经斯基还与《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劳动界》周刊创始人李汉俊等人就中俄两国的革命情况交换意见。^[11]1921年6月, 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 尼克尔斯基系化名, 其原名为 Владимир Абрамович Нейман)来上海, 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二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③马林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2]

除了在中国开展建党活动, 共产国际还陆续派员到其他国家参加共产党的组建工作, 吉原太郎(Таро Есихара)就是共产国际在日本的代理人。1921年6月, 吉原太郎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并于1921年秋天被派往日本, 与日本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通过这种“嵌入式”的活动, 共产国际以及苏俄革命对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921年以前, 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主要聚焦于经济斗争, 对于政治运动并无过多兴趣, 后来因为“受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影响”, 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开始由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领域。^[13]

四、利用各种出版物广泛传播

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是《共产国际》杂志(还有《国际新闻通讯》)。该刊创立之初就以“创办一个能成为全世界共产党思想中心的中央机关刊物”^{[4](736)}为目标, 用德语、法语、英语和俄语四种语言出版, 每年12期。《共产国际》虽然以莫斯科为出版中心, 但是其征稿、编辑、印刷、发行都不限

① 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

② 共产国际负责东方事务的组织机构调整频繁, 1920年8月,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东方民族处在伊尔库兹克成立, 下设地区科(包括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蒙藏科), 宣传出版科和联络科, 东方民族处于1921年3月被改组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正式成立, 负责同中国、日本、朝鲜、荷属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

③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忆, 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一大的第一天和第四天会议, 第二天和第三天会议并未出席。第四天会议刚开始, 一个陌生人闯入会场说:“对不起, 我找错地方了。”马林出于安全考虑, 建议临时中止会议, 少顷, 即有巡捕房前来搜查。随后经商议, 中共一大的后半程会议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

于俄国。以 1919 年为例，当年《共产国际》有 6 期在维也纳翻印、5 期在柏林翻印。

《共产国际》杂志是共产国际（包括列宁本人）以及各国共产党权威性的发声渠道，列宁撰写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即刊载在《共产国际》杂志 1919 年 5 月第 1 期上；列宁发表的《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意》等重要信件也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此外，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法国共产主义小组提交的报告、瑞士革命运动的报告等重要文献都在《共产国际》上公开发表。部分无法到会的国家则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登了表态性声明，如《共产国际》1919 年 5 月 1 日第 1 期刊发了匈牙利共产党发表的声明，称“同意大会的各项决定”；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也在同期发表声明，表示：“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都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就是苏维埃政权。”

除了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苏俄报刊也成为各国共产党交流革命运动的重要载体，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小组等就纷纷在《真理报》上发文祝贺共产国际的成立，同时介绍了各国的革命形势，交流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方法。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主席团还在以三种文字出版的《莫斯科》报上提前刊登了大会议程。

此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自成立起便设立在苏俄，如芬兰的党中央就设立在彼得格勒，在俄国建立了将近 25 个共产主义组织，创办了两种杂志、一份报刊，出版了 40 余种小册子，^[14] 从彼得格勒向侨居俄国的芬兰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根据共产国际关于报刊宣传活动的规章和建议，各国共产党也纷纷出版报纸、杂志、小册子，开展宣传活动。除了法国、德国、乌克兰等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报刊外，各国共产党陆续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如奥地利共产党的《红旗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权利报》（于 1920 年改名为《红色权利报》），美国共产党的《共产党人报》（1924 年改名为《工人日报》）和理论性月刊《共产党人》等。这些报刊不仅是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组织动员民众和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载体，也在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以及各国共产党之间发挥着纽带和桥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的国际传播活动虽然载体众多，但始终注重内容的质量，这一点深受列宁影响。列宁对共产国际的新闻出版工作极为重视，亲自抓质量问题。例如莫斯科国家出版局出版的《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至七日》^[15] 小册子，因为没有序言，没有记录，没有确切的决议原文，且未把决议同演说、论文、评论分开编排，列宁给国家出版局华·华·伏罗夫斯基（Воровски）写信提出批评，并要求出版局明确回复既有小册子的刊印量、发出量，并提出整顿措施，组织重印。

五、针对不同议题、不同群体进行精准传播

自 1919 年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就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因而针对不同阶段革命斗争的需要进行精准传播势在必行。共产国际充分吸收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共产党人的舆论斗争经验，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革命任务重点和传播对象，展开了精准化、针对性的传播实践。

一是针对不同群体进行传播。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于 1899 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就指出，“报纸如果想成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16]，这成为列宁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俄国工人水平参差不齐，列宁因此将读者划分为工人中的知识分子、中等水平和中等水平之下三类读者群体。他进而针对性地指出，对于工人中的知识分子，报纸应“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16] (234)}，以满足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对于可能“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16] (235)} 的中等水平工人读者，列宁提出报纸不能降低自己的水平，而应帮助从工人的中间阶层中培养出先进工人，进而提高读者的水平；而对于“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的群

体,应采用“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来进行“播种”和“开荒”^{[16](235)}。采取多种方式、针对不同群体特点进行宣传的理念一直贯穿于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实践活动中。

二是针对不同阶段的斗争形势进行传播。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一些共产主义者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利影响以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全面崩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正在进行“最后的决战”^[17]。针对这种盲目乐观情绪,共产国际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20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革命逐渐转入低潮,共产国际又根据新的形势调整斗争策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召开前,列宁对于具有左倾冒险倾向的“进攻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并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宣传策略应为“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17](10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宣传口号。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斗争策略调整的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针对各国共产党人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争论,《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8期刊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一文,重申共产国际新策略的特点就是“到群众中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全部日常的和细小的斗争……不倦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思想”^[18];而“大喊大叫的‘鼓动’既不会给工人们增添一尊大炮,也不会增添一颗手榴弹”^{[18](214)}。

此后,在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报告,对斗争策略的调整再次进行阐释。共产国际将这一报告全文刊载在1922年11月11日出版的《真理报》上,供各国共产党人学习,为各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调整指明了方向。

三是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定向传播。关于共产国际的办报策略,列宁曾强调指出,共产国际在研究统一的斗争策略的同时,也要给各国共产党以主动权,“根据该国的条件和环境加以具体化”^{[18](232)}。

以此为原则,共产国际力求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求进行定向传播。例如,对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共产国际提出“应当善于在国内普遍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18](234)}的建议;针对美国,建议“应当特别有力地提出旨在保护失业者等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针对瑞士共产党在宣传革命统一战线中迫使工会官僚召开工会紧急代表大会的情况,提出“在全体瑞士工人面前揭露改良主义的虚伪性”^{[18](235)}的建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共产国际有意识地进行针对不同国家的定向传播,但由于各国国情以及通讯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共产国际难以做到对各国情况的即时了解。

六、结 语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的建立使各国无产阶级有了一个团结的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促进了各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它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其高度集中的组织管理形式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以及与各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以中国为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由此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共产国际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一直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与领袖的身份自居。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因白色恐怖由上海秘密迁至江西苏区后,王明等人坚持走“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指1929年共产国际陆续给中共中央发来的四封指示信),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长篇讲话,其讲话内容与中共洛川会议、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独立自主作战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张背道而驰,引起党内关于抗战问题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19]。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同时也为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需要,经各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参考文献:

- [1]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1.
- [2] 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 [3]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83-484.
- [4] 王学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198.
- [5]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列宁·共产国际大事记:1914—1943[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94.
- [6] Cannon, J. (1962). *The first ten years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York: L. Stuart.
- [7]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7-323.
- [8] [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EB/OL].<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mia-chinese-communist-international-1923.htm#4>.
- [9] 程曼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兼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J].新闻与写作,2019(11):65-70.
- [10] 张以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N].光明日报,2021-7-5(12).
- [11] 程曼丽,赵晓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新闻思想的形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26-32.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6.
- [13] 施伏亮.日本无产政党研究[M].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14-15.
- [14] 王学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42.
- [15] [苏]列宁.列宁论报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278-279.
- [16]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4.
- [17] 宋洪训等.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07-108.
- [18] [苏]格叶·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06.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0.

[责任编辑:高辛凡]